

勵耘學刊

(文学卷)

2012年第1辑
(总第15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励耘学刊. 总第 15 辑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77-4040-0

I. ①励…Ⅱ. ①北…Ⅲ.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丛刊

IV. ①I206-55 ②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7662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 787×1092 1/16

印 张: 33.75

字 数: 54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8.00 元

《励耘学刊》（文学卷）编委会

顾问 童庆炳

主编 郭英德

副主编 李春青 李 山 杨联芬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翠玲 万建中 王向远 方 宁

乐黛云 过常宝 刘 利 刘晓南

孙银新 李 山 李正荣 李宇明

李运富 李国英 李 怡 李春青

李 强 杨 义 杨联芬 吴福祥

张 健 张涌泉 张清华 陈思和

郑国民 项 楚 赵 勇 姚建彬

郭英德 黄开发 曹卫东 盛 宁

董晓萍 蒋原伦 蒋冀骋 温儒敏

冯胜利 (美国) 大西克也 (日本)

徐富昌 (中国台湾) 黄坤尧 (中国香港)

李欧梵 (中国香港)

编 务 许庆江

目 录

新视域

先秦诸子著作的文体种类、属性及文本形态和特色····· 李炳海 (1)

新诗音韵的探测：20 世纪上半叶诗歌朗诵的

功能与意义····· 张桃洲 于晓磊 (21)

《穆木天文集》导语 ····· 陈 惇 (35)

散文史研究

以“文变染乎世情”为宗旨的古代散文史撰述

——以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为例····· 阮 忠 (68)

古代散文史研究中的“遮蔽”问题

——拜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心得····· 欧明俊 (79)

明代八股文的初期形态····· 刘尊举 (98)

文学与教育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张 健 (117)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与现代文学

——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为中心····· 姚 丹 (120)

“国民常识”与“文章义法”

——从小学教科看民初“国文”观念的塑造····· 陈尔杰 (137)

文化研究

“文革”以前京剧改革中对写实的追求及其矛盾 …………… 赵得昌 (159)

论《逸周书》写作的时代与地域

——兼与刘起釞、李学勤先生商榷…………… 牛鸿恩 (172)

说笔记中传记史料的真实性问题…………… 祝鼎民 (200)

青年园地

《尚书·虞夏书》与《诗经》的副词比较…………… 刘姝辰 (218)

个人情感的激发与理性演绎的艰难——论巴金的《家》… 李 哲 (247)

张玲译作中的女性主义干涉策略

——以小说集《牧师情史》为例…………… 王超然 (259)

品书录

世界视野、学科意识、人文品味

——读刘洪涛先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视野》… 张 珂 (272)

征稿启事

先秦诸子著作的文体种类、属性及文本形态和特色

◇李炳海^①

摘要：先秦诸子著作的文体种类多种多样，其中有散文，也有韵文；在散文中既有说理文，也有叙事文。诸子著作的文体名称，往往与文体的属性有密切关联。由于诸子著作的成书方式存在口传笔录与作者直接书写、个人独撰与集体编写的不同，文本形态也出现许多差异。先秦诸子的文章，可划分为简约型和繁复型两种类型，是两条并列的曲线，而不是一条直线。先秦诸子著作的个体风格，可以根据作者的社会角色加以界定，这样可以显示出彼此之间的差异。把先秦诸子著作概括称为说理文，用语录体和对话体、专论体为线索去描述诸子文章的演变，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做法。

关键词：诸子著作；文体；文本；风格特征

对先秦诸子著作的文学研究，是从古到今的显学，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许多重要问题已经达成共识，成为定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达成共识的结论都是科学的、正确的，不少定论尚有进一步斟酌推敲的余地。另外，就科学研究本身的担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日益确切、清晰，更加接近历史实际，即使已有的正确结论，也还有进一步补充完善的必要。

先秦诸子著作的文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的文体、文本形态及特征，这是立足于文学本位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也是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教学的重要内容。几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对于这方面问题均有专章或专节进行论述。受文学史体例及编书期间研究状况的制约，有一些问题无法进行深入论述，也有一些结论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有鉴于此，归纳出以下几方面的论题，期待引起学术同仁的关注，并展开研

^① 李炳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究和讨论。

一、文体形态的多样化

对于先秦诸子的著作，文学史著作和教材通常把它称为政论文、议论文、理论文或说理文。这种概括得到普遍的认同，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这种界定把先秦诸子论著与那个时代的韵文作品《诗经》、楚辞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把它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传文学作品纳入不同系列，用以显示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叙事文体与说理文体的差异。从总体和表面上看，对先秦诸子著作所作的文体界定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著作的外壳多是说理、议论，是各学派为阐述自己的主张而作。但是，对于任何问题的研究都不能只看外壳，停留于表面现象，而要深入内核，揭示外壳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如果真的做到这样，就会发现把先秦诸子著作界定为说理文、议论文只是具有相对的合理性，还存在只重外壳而忽视内核的倾向。

散文和韵文是两个不同的文体类别，但是，它们在先秦时期并不是界限清晰、泾渭分明的，而是带有模糊性。从先秦诸子著作来看，固然以散文为主，但也不乏韵文，《老子》就是一部以诗的体式阐发哲理的著作。诗的文体特征是要押韵，《老子》确实是韵文，有的学者已经对它各章的韵部作了归纳。^[1] (P153-158) 黑格尔谈到象征型艺术时有如下论述：

箴铭、格言和教科诗之类品种都取材于某些特殊领域的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用简练的语言，把某一对象、情境和范围中带有永恒意义和真正本质的东西比较零星地或比较完整地表现出来，使人可以认识到。^[2] (P105)

按照黑格尔所下的定义，《老子》一书完全可以称为箴铭、格言，它阐发的是哲理，用的是诗的形式。除《老子》外，《文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用韵文书写的篇章或段落，有的还相当精彩。至于《荀子·成相》篇，更是一首标准的杂言诗。已经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对于先秦诸子的韵文已经有所关注，^[3] (P83-85) 但是关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尚没有从根本上对先秦诸子著作的文体归属进行深入思索和探讨。

称先秦诸子的著作为说理文、议论文，从而把它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传文学作品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系列，从而显示二者的说理和叙事的文体属性，这是学界及文学史著作普遍采取的做法。可是，先秦诸子的著作并不都是以说理为主。《汉书·艺文志》列诸子十家，排在最后的是小说家。其中《青史子》五十七篇，班固自注：“古史官记事也。”^{[4] (P1744)}《虞初周说》九四三篇，应劭称：“其说以《周书》为本。”^{[4] (P1745)}由注解可知，《青史子》、《虞初周说》或出自史官，或以《尚书》及《逸周书》等叙述周代历史的文献为取材对象，显然这两部著作主要是进行历史叙事，而不是进行议论，不能把它们归入说理文。

再从影响很大的先秦诸子代表性著作来看，其中叙事的成分也占较大比例。古传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对于《左传》和《国语》，也有重在记事还是重在记言的划分。言和事是史传文学的主要构成因素，用这个尺度来考量先秦诸子的著作，以叙事为主的篇目及段落比比皆是。《论语》对孔子既记其言，又记其事，有的构成相对独立的叙事段落。《公冶长》篇众弟子侍坐、各言其志的场面描写，《微子》篇孔子与几位隐士的相遇，都是典型的叙事段落。至于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总体框架是叙事，孟子的议论置于这个总体框架之中，是叙事的组成部分。《韩非子》被称为先秦说理文成就最高的著作，可是，其中有许多篇目，却是叙事的文字居多。《说林》、《储说》自不必言，就是《十过》、《喻老》这两篇以说理为外壳的作品，内里主要的文字都是叙事。至于《庄子》、《列子》等往往采用寓言方式进行表述的篇目，叙事成分所占的比例明显多于议论性文字。上述事实表明，把先秦诸子著作界定为议论文、说理文，从而把它与叙事文区别开来的做法是不科学的、片面的，应该兼顾其中大量的叙事因素。

先秦文学作品的基本形态是文、史、哲不分，这种看法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先秦文学作品的基本形态还有更深的一个层面，那就是各种文体的界限不是很清晰，而是比较模糊，韵文和散文、叙事和说理，往往相互杂糅，兼容并存。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而不能简单、片面地对诸子著作进行文体界定。

先秦诸子著作的文体形态具有多样性，如果忽略这种历史事实，对于后代文学的研究势必遇到困扰。例如，把《论语》界定为语录体的说理文，可是，《史记·孔子世家》作为叙事体的人物传记，却是以《论语》为基本依据。把《韩非子》界定为先秦议论文的代表作，然而，后

来以叙事为主的说体，却是源自《韩非子》。把先秦诸子著作界定为散文，后代的杂言诗、连珠却是从先秦诸子著作中脱胎而出。凡此种种，都说明必须承认先秦诸子著作文体形态的多样性，分门别类地进行审视、研究，而不能笼统地称为说理散文或议论文。那么，对先秦诸子的著作该如何称呼呢？这似乎要回归到传统的大语文观念，称它为文章似乎更为稳妥。

刘勰《文心雕龙》对先秦诸子著作所做的处理颇为独到，列在《诸子》前面的是《史传》、后面的是《论说》。刘勰看到了诸子著作文体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没有简单地把它归入《论说》，而是进行单列。《诸子》开篇称：“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刘勰承认先秦诸子著作是论道见志之书，同时又不等同于常见的论说文，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二、文体名称的由来及文体的生成

先秦诸子文章的体式多种多样，如何准确地把握各类问题的特征，是推进这个领域研究的关键之一。先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轫阶段，也是多种文体的最初生成时期。准确把握相关文体的特征，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追本溯源的性质。在此过程中，需要有词语的训诂考据，更要深入文本内部进行细致的考察。

关于《论语》一书名称的由来，章太炎先生做过如下阐述：

“论”者古但作“仑”，比册成竹，各就次第，是之谓仑。箫亦比竹为之，故“侖”字从“仑”，引申则乐音有秩亦曰仑，“于论鼓钟”是也；言说有序亦曰仑，“坐而论道”是也。《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秩，斯曰《仑语》。是故绳线联贯谓之经，薄书记事谓之专，比竹成册谓之仑，各从其质以为之名。^{[5] (P54)}

章太炎先生是从文字训诂和古代典籍书写、装订方式两个方面切入，阐述《论语》一书的得名。他对仑字所作的解释，取自《说文解字·亼部》及段玉裁注，但表述得更加清晰确切。如果能够继续沿着太炎先生的路子前行，采用国学的方法进行研治，《论语》的文体特征不难得到揭

示。遗憾的是后来的《论语》研究者未能赓续这种传统，采用了简单的处理方法，对《论语》文体的认定流于表象、失于片面。

仑的本义是把写有文字的竹简按照次第串联起来，编排在一起，正如段玉裁所说：“聚集简册必依其次第，求其文理。”^{[6] (P223)} 论，构形从言、从仑，仑指的是有条理，《论语》一书同样具有这种属性。孔子作为百代宗师，他的话语条理性很强，这是众所公认的。《论语》的条理性还体现在整部书的结构方面，朱熹已经发现它的这种特点。对于首篇《学而》，他在解题中写道：“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门之道，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7] (P55)} 朱熹认为《学而》篇所收孔子语录有一条线索进行贯穿，都是围绕务本这个主题。他在《微子》篇的解题中写道：“此篇多记圣贤之出处。”^{[8] (P214)} 《论语》共二十篇，其中十篇朱熹作了类似的解题。至于其他十篇，朱熹因为没有准确地把握而付之阙如。朱熹的解题表明，整部著作在篇目编排上的条理性，是它重要的文体特征。

《说文解字·言部》：“语，论也，从言，吾声。”段玉裁注写道：“此即毛、郑说也。语者，御也。如毛说，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如郑说，与人相问答辩难谓之语。”^{[6] (P89)} 段玉裁的解释是正确的，语字构形从吾，有抵御之义。《诗经·大雅·公刘》毛传称：“论难曰语。”无论毛传还是郑玄，都把语字解释为辩论，道出了语字的本义。语指交谈、辩论，而不是单独个人自言自语。《论语》所录主要是孔子与弟子及其他人的对话，有的记载了当时的语境，有的则只录孔子的话语，对话的另一方被略去，尽管如此，《论语》中的语字，指的是对话，而不是独言。把《论语》说成语录体，而与其他对话体区别开来，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因为语字本义指的是对话，而不是独言。

对文体特征的准确把握，有时需要进行动态考察，而不能停留于词语的训诂。比如，对说体文章的考察，就必须兼顾横向和纵向的变化。

说，字形从言、从兑。《说文解字·儿部》：“兑，说也。”段玉裁注作了如下解释：

说者，今之悦字，其义见《易》。《大雅》：“行道兑矣。”传曰：“兑，成蹊也。”“松柏斯兑。”传曰：“兑，易直也。”此引申之义。《老子》：“塞其兑，闭其门。”借为阅字，阅同穴。^{[6] (P405)}

段玉裁所引《诗经》的句子，见于《大雅》的《绵》和《皇矣》。《绵》中的“行道兑矣”，指道路畅通。《皇矣》写道：“柞棫斯拔，松柏斯兑。”这里的拔和兑意义相同，都指把树木去掉，使道路畅通。段注所引《老子》之文见于第五十二章，对于其中的兑字，河上公注：“兑，目也。”“门，口也。”^{[9] (P199)}河上公的注释大意得之，这里的兑、门，均指人的感官，它是人与外界接触的通道，兑，取其与外界相通之义。兑，指的是通达，《周易·说卦》正是如此认定：“兑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兑与人的口相对应，毁折、附决指的是冲毁、溃决，也是通畅之象，并且达到极点。说字构形从兑，兑字有通畅、通达之义。作为说体文章，取的正是兑字的这种意义，要求言辩论说通透、畅达，有穿透力，这是说体的基本属性，也是文体本身自然形成的特征。

《说文解字》以悦释说，段玉裁注引《周易》加以印证。《周易》有《兑》卦，《彖》传就是把兑释为喜悦。《序卦》也是如此。说字构形从兑，因此也有喜悦之义。对于说体而言，所谓的喜悦，指所说的话语乐于为对方所接受，从而使得施受双方实现顺利的沟通。这样看来，说体的界定应该兼顾两个方面：一是它本身的属性，要求言语通透畅达；二是它的功能效应，说辞要使对方乐于接受。这是说体所应具备的主要条件。

说体是在游说过程中形成的，由于游说主体和游说对象的多种多样，从而使得说辞存在许多变数，文体形态有多种风格。《韩非子·难言》篇列举伊尹说汤、文王说纣等一系列历史故实，用以阐述“愚者难说”的道理。他以《难言》为篇题，实际是论述游说之辞面临的诸多困难，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说体的多种弊病及风格。《鬼谷子·权篇》对于说辞也有具体论述，并且从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10] (P141)}

《邓析子·转辞》篇亦有此类论述，文字小异，也是根据言说对象的具体情况，决定所采取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使说辞具有不同的风格。把《鬼谷子》的上面论述与《韩非子·难言》及《说难》对读，可以从

横向上对说体的特征进行动态把握。

《韩非子》的说体文章分为两类：一类是《说难》、《八说》，以议论为主，叙事所占比例很小；一类是《说林》、《储说》、《说疑》，主旨是言道明理，但叙事所用的文字量很大。《韩非子》的说体有两种类型，它在后代沿着不同的方向演变。以议论为主者演变为汉代的政论文，以叙事为主者则是古代小说的滥觞。正如屈守元先生所说：“名之为《说苑》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韩非子》的《储说》和《说林》……这些以‘说’为名的典籍、篇章，它的特点，往往近于讲故事。”^{〔11〕（P3）}屈先生把说体视作“颇具中国特色的古代‘说话’形式”，可谓不易之论。《韩非子》的《说林》和《储说》，确实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直接源头之一，它不但奠定了基本的叙事模式，而且规定了叙事的题材是以历史传说为主。汉代的叙事散文都依傍于历史，延续了《韩非子》说体的传统。把说体放到文体演变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对于这种文体所具有的价值会有更加明确的认识。

先秦诸子著作涉及多种文体，各类文体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如何通过对比准确把握问题的特征，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如《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都是为解释《老子》而作，可以称为经传体，即为经作传。但是，《解老》纯用论述，而《喻老》是用历史传说加以说明，二者文体形态迥异。沿着这个线索进行追寻，会发现冠以解字的经传体文章，采用的均是议论的方式，如《管子》的《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等系列文章，都可以与《解老》篇相互印证，成为解经体的标准样式。而《喻老》篇的解经方式，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则比较罕见。

三、成书方式与文体形态的关联

先秦诸子著作的成书方式是不同的，其中有口传笔录与直接书写的区别，还有个人独撰与集体编写的差异。从成书方式的角度切入去研究先秦诸子的著作，古代学者已经多有建树，但仍有可供开拓的空间，并且是当前诸子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先秦诸子有的著作是以口传笔录的方式成书或成篇，对于这种成书方式，古人早就予以关注。朱熹为《论语》各篇解题，往往标出该篇的

整理者。《公冶长》篇称：“胡氏以为疑多子贡之徒所记云。”^{[7] (P87)}《先进》篇解题称：“胡氏曰：‘此篇记闵子骞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称闵子，疑闵氏门人所记也。’”^{[7] (P145)}《论语》是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根据口耳相传的材料整理而成，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有些弟子受教时的记录。一部著作是以口传笔录的方式成书，还是由作者直接书写，这两种成书或成篇的方式对于文章的内容、形式及风格有直接关联。《荀子》绝大部分篇目是作者撰写，无论说理文，还是诗、赋，各篇均有明确的主题，行文布局有方圆规矩可循。书中的《大略》、《宥坐》在行文风格上与前面的作品明显不同。杨倞在《大略》篇解题中称：“此篇盖弟子集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不可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12] (P485)}杨倞看到了荀子门人所辑录的材料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且论述比较简略，与荀子自作之文存在明显的区别。杨倞的解题提示人们，应该把荀子自撰之文与门人的口传笔录加以区分，不能混为一谈，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提示无疑是有道理也是有价值的。

《墨子》一书的主要篇目是其弟子根据听课记录整理而成，作为全书主干的八论有上、中、下，实际是三个系统的记录整理稿。《墨子》的主要篇目和《论语》一样，都是以口传笔录的方式成书，即孔子、墨子口传，由各自的门生弟子辑录成书。可是，如果对两部著作进行对比，会发现在整体风格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论语》一书多是吉光片羽，短章简论，只有个别条目篇幅稍长，属于特例；《墨子》则不同，不论是作为全书主干的八论，还是记载墨子行迹言论的叙事作品，以及排在前面的《亲士》、《修身》、《所染》等篇，都是采用详写详论的写作方式，有些篇目还显得铺张扬厉，大量运用排比。《墨子》与《论语》的行文有明显的繁与简、详与略的差异。

如何看待《论语》和《墨子》两书在整体风格上的差异？从所处历史阶段考察，二人相距不远，不是时代悬隔所造成的。从个人素养和表达方式上考察，并非墨子擅长言语表达而孔子言语简约，其他先秦典籍所载孔子言论，不乏长篇大论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还要从成书方式方面进行探索。孔子的行迹言论除载于《论语》外，还见于《国语》、《左传》，以及《礼记》、《大戴礼记》等诸多文献。这些文献对孔子所作的记载，有许多篇章较之《论语》大为详细、具体，而且文字总量很大。可是，《论语》并没有把上述文献的相关材料全都纳入书中，而只是选取极小的一部分。《国语·鲁语》有几个条目专门记载孔子在鲁国的言

行，叙事完整，基本是照录孔子的大段话语，就是这类载于正史的可靠材料，《论语》也没有纳入。由此可以看出，孔门弟子在整理先师口传笔录的材料时，并非细大不捐，兼收并蓄，而是有所选择，把那些最能体现孔子思想和人格并且得到整理者认可的材料结集成书。用现代的语言表述，《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的选本，而不是全本；是选集，而不是全集。《墨子》一书的情况则与《论语》明显不同，孙诒让《墨子閒诂》附毕沅所辑墨子佚文二十一条，孙诒让又增补六条。其中除三条文字较长外，其余多是只言片语。这个事实表明，绝大多数与墨子相关的文献基本全都收入书中，其中的八论作为讲课记录，在进行整理时也基本保持原貌，没有作筛选，甚至保留了记录稿许多讹误的字句。

《孟子》、《庄子》的成书过程比较复杂，历史上争议颇多。^{[13] (P3-8)}比较一致也是比较折衷的看法是，这两部书有孟子、庄子本人的直接参与，也有门生弟子的笔录。从这两部书的文本形态考察，它们是由口传笔录到作者直接书写的过渡阶段的产物，兼有两种成书方式的痕迹。而《庄子·内篇》为庄子本人自撰，系作者直接书写。不过，这两部书即使是口传笔录的篇章，沿袭的仍是《墨子》的行文风格，而不是效法《论语》。

由作者直接书写的著作，在先秦诸子中又有个人独撰和多人参与两种情况。《荀子》一书除《大略》、《宥坐》等少数篇目之外，其余都是荀子自撰。《韩非子》则均是出自韩非之手。至于由多人参与而完成的著作，则是以《管子》和《吕氏春秋》为代表。

一部著作是由作者独撰还是多人参与写作，两种不同精神产品的制作方式，所生成的成果必然存在许多差异。就是多人参与而完成的著作，所生成的成果也往往相去甚远，《管子》和《吕氏春秋》就是如此。

《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把《管子》的著作权归于管仲，实际上，这部书是出自多人之手，是稷下学宫学术成果的结晶。先秦诸子著作体现的是学术繁荣、思想自由时期的百家争鸣，多数著作带有明显的学派色彩，是以诸家分立的方式体现那个时代学术自由的。《管子》则是通过一部书反映出那个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观。《汉书·艺文志》所列的诸子十家，除小说家较少涉及，其余九家的学说在《管子》中均有反映，就是在其他诸子中比较罕见的农家、阴阳家，在书中也有一席之地。《管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著作，而是一部文集，是各类文章的结集。正因为如此，全书没有统一的体例，没有既定的行文格式，而是各种写法

争奇斗艳，根据表现对象的性质及所要表达的理念而生成多种多样的文本形态。《管子》一书出现的文体极其丰富，并且多有建树。《大匡》、《中匡》、《小匡》等叙述齐桓公称霸的篇目，在叙事的连续性和详细性方面胜过《左传》、《国语》。书中许多篇目是以齐桓公和管仲对话的方式展开，把问对体的应用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领域。书中不但有大量的问对，还有只问而不答的奇文。《问》篇的主体部分连续六十余问，虽然意在彰示执政为官之道，行文上却具有后代辞赋的铺张扬厉之风。《管子》书中有多篇解经体文章，经和传或是分立篇目，或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先经后传，使这类文体以成熟的形态出现。《管子》作为一部出自多人之手的文集，在思想内容和文体选择、表达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反映出百家争鸣时代在学术、思想以及写作上的自由，以驳杂的风貌为那个时代作了总结。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组织门客所编，它不是漫散而无统一主旨的文章结集，而是精心设计的具有完整严密体系的著作。《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八览、六论，体现的是天、地、人三才相贯的模式：十二纪从一年十二月而来，取法于天；八览由八方而来，取法于地；六论由六义而来，取法于人。从哲学理念方面进行划分，十二纪主要依据阴阳五行说，八览的八则与《周易》八卦有关，至于六论则与秦朝数字用六相契。从总体上看，《吕氏春秋》的框架、结构是合理的，体系也是完整的。但是，如果深入到这部书的内部，就会发现它所存在的明显不足。这部书思想内容驳杂，先秦诸子各家，天文、地理、社会许多领域都有涉及，但没有新的突破，在深度方面流于一般化。就其所运用的文体而言，以议论为主，同时穿插一些寓言故事，无论是所用文体的种类，还是所用文体本身所发生的新变，都无法与《管子》一书相比。究其原因，就在于《吕氏春秋》的编写过于追求均衡、整齐。十二纪、八览、六论，不但每个单元的篇目是固定的，而且各篇的字数也有限制。本人在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过程中，曾经建议对《吕氏春秋》各篇的字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除少数如《本味》等篇外，其余各个单元内部每篇的字数相差不多。显然，这部书的编写对各部分预先有字数上的规定，否则不会如此整齐。《吕氏春秋》所追求的均衡、整齐并没有促进文章写作的进步，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把编写变成工艺制作，工具化的趋向很明显。《吕氏春秋》这部书标志着百家争鸣式的文章写作时代的终结，大一统背景下集体编书模式的出现。如果说《管子》所录文章体现的是百舸争流的思想、

写作的自由，那么，《吕氏春秋》寄托的则是朝宗于海的情结，而它所预设的文章之海，无法使百川入海之后有自由奔涌的空间。

四、文本形态演变的线索和脉络

对于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的演变，通常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语录体、对话体和专论体。《论语》、《墨子》为语录体，《孟子》、《庄子》为对话体，《荀子》、《韩非子》为专论体。影响很大的几部文学史，基本是按照这种模式描述先秦诸子文体演变的。这种描述有可取之处，它能够超越学派的畛域而着眼于文本形态，并且从时间顺序的角度进行审视，所持的是进化论的理念。可是，这种描述与先秦诸子著作文本形态演变的历史实际有多抵牾，很难相契。首先，把《论语》界定为语录体而与对话体相区分，这就与《论语》的书名发生矛盾，因为语字最初表示的就是对话，书中也确实多有对话。其次，把《墨子》定为语录体，可是，把它和作为专论体代表的《荀子》、《韩非子》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尤其作为《墨子》主体的八论，称它为专论体也是名副其实。所以，对于先秦诸子著作文本形态的发展演变，需要转换审视的角度，分系统地加以梳理。

从先秦诸子著作的文本形态来看，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简约派系统，另一个是繁博派系统。这两个系统并存，各自有演变的轨迹，同时，两个系统之间又有交会和融合，形成一个演变的网络。

简约派系统的奠基之作是《老子》和《论语》。《老子》是老子本人独自撰写，《论语》是孔门弟子集体编纂，尽管它们分属于不同学派，成书的方式相异，但在文本形态方面都是简约型的，言简意深、词约义丰是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它们之所以成为道家 and 儒家的最初经典，与简约型的文本形态不无关联，这种文本形态为学派的后继者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同时也以此彰显出它们作为经典的权威性。继承《老子》简约型文本形态的是《文子》，这部书假托《老子》立言，实际是对《老子》所作的阐释。尽管章节的单位字数较之《老子》有所增加，但总体上保持了简约的风格，其中的《符言》篇与《老子》一书的文本形态最为接近。除此之外，现今可以见到的《鶡冠子》、《鬼谷子》也都是简约型的文本形态。至于儒家学派继承《论语》简约型文本形态的著作，传